

法治社会容不得“特殊公民”

□本报评论员 郭振纲



在黑恶势力建立“黑金帝国”的过程中，无时无刻不夹杂着公民权利被侵犯、公共利益被侵害、社会秩序被践踏的种种恶行。今天，我们在欣慰于这个“毒瘤”被最终除掉的同时，更应该反思黑恶势力坐大的深层原因。

“快递员月薪过万很普遍”言过其实了

□余明辉

据《21世纪经济报道》10月21日报道，“现在大城市里某些行业的农民工收入不比刚刚入职的大学毕业生低，现在的快递员，月收入过万是很普遍的，一些从事电气修理、厨卫设备修理行业的农民工，随便上个门就收几百块。”中国人大农发学院副院长郑风田表示。

时下，网上购物以其方便快捷的特点迅速普及开来，与此相应的，是快递员大量出现在我们身边。近几年，在一些大中城市，快递员的月工资有了较大增长，不排除一些特殊时段，“工资过万”是可能存在的。但能不能就此说“快递员月收入过万很普遍”呢？

就在同日，《长江日报》报道，随着“双11”的到来，武汉各大快递公司开始招兵买马，一个招聘噱头就是快递员旺季收入可能超万元。《华商报》今年3月也报道过，来自陕西省西安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网站的信息显示，快递员的月薪待遇2500元“起步”，可达5000元。至于万元工资，也有，只是小概率。赶集网的数据显示，目前快递员月薪超过8000元的城市中，深圳比例最高，其次为重庆、成都、青岛、上海、杭州等；月薪为5000元至8000元的档次中，北京比例最高，青岛位于上海、东莞、深圳、成都和重庆之后。

据新华社10月21日报道，备受关注的刘汉等特大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刘汉、刘维等5人经一审判处死刑，上诉至二审维持一审判决后，目前正等待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结果。办案人员表示，以刘汉为代表的黑恶势力，利用金钱、权力、暴力，游走在法律之外，在“黑道”上呼风唤雨，他们逐渐变成无视法律、称霸一方的“特殊公民”。其长期逍遥法外，背后折射出深层次的法治信仰“缺氧”、法治建设“缺钙”等问题，发人深省。

先靠暴力壮大，完成经济积累；逐渐转至幕后，参与资本经营；继而“黑衷”慈善，换取“省政协常委”等政治光环……一系列运作使刘汉等人逐步完成从“涉黑”到“洗白”，

再到“披红”的身份转变。其长达20多年坐大成“特殊公民”的过程，给公众绘制出一幅权钱交易的图景，给社会展现出官商勾结破坏社会秩序、经济秩序的卑劣图画。

无疑，黑社会集团的犯罪行为给国家、社会造成巨大伤害。在这些“特殊公民”的犯罪过程中，在其建立“黑金帝国”的过程中，无时无刻不夹杂着公民权利被侵犯、公共利益被侵害、社会秩序被践踏的种种恶行。今天，我们在欣慰于这个“毒瘤”被最终除掉的同时，更应该反思黑恶势力坐大的深层原因。

首先，黑恶势力坐大，最根本的，是一些地方法治建设的不完善，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原则成了一句空话。刘汉黑恶势力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等违法

犯罪活动数十起，造成8人死亡，多人受伤。如果有关部门能够在相关案件中做到依法办事，其犯罪行为无论如何也不会延续20多年，公民的权益也不会被肆意侵害而无法得到救济。

其次，黑恶势力坐大，反映出一些地方对官员的监督机制存有漏洞。有统计分析显示，每一起黑恶势力坐大的案件，几乎背后都存在保护伞，存在庇护人。这些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庇护人的官员，多是一方要员或掌握较大权力的公职人员。他们利用公权力为黑恶势力提供保护、庇护，其行为并不是无迹可寻，也不是无人发现，更不是无人举报。可是，有关部门对这些官员的行为没有进行必要的制止和处罚，监督制度失去了应有的效力。

再次，黑恶势力坐大，反映出一些地方对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利益的保护存有漏洞，对公众的举报监督缺乏应有的重视。无论是暴力强拆，还是违法经营，抑或巧取豪夺，黑恶势力一步一步将国有资产变为已有，一步一步将他人财产霸占为己有，在这一过程中，公众监督没有显示出应有的力量，公众举报被漠视甚至被打压，都暴露出监督机制有待完善之处。

黑恶势力坐大，教训深刻。它警示我们：依法治国、建设法治社会，与国家、与百姓的利益息息相关。我们必须从法治教育、制度建设、司法改革、公众监督等多方着力，铲除“特殊公民”滋生的土壤，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捍卫社会公平正义。



游客拍碎鱼缸？

据新华社报道，在经历长期拍打后，湖北武汉东湖海洋世界价值12万元的鱼缸被拍裂，园方日前进行了更换。据介绍，该鱼缸本足以承受90多吨水产生的压力。4年前，一中学生用尖锐物在玻璃上敲了条细小裂缝，园方进行了修补。但近年来不少游客为引起中华鲟注意，剧烈捶打玻璃，导致缝隙越来越大。

为观赏鱼儿游动，敲打鱼缸；为让老虎醒来，往它们身上扔石子……一两个人这么做，或许不会造成太严重的后果，但长年累月，每天都有人这么做，早晚会出现问题。近年来，相关部门力促文明旅游，号召每一个人都为文明加分，除了随地丢垃圾、在古迹古物上刻画这种公认的不文明行为，顺手拍打鱼缸、摸摸古董这种不经意间的小动作或许还未引起大家注意。

狱中“骗人不倦”

据《京华时报》报道，今年38岁的郑某，曾因诈骗罪先后3次被判刑近15年，近日，他再次被指控于2012年10月17日出狱前在狱内偷用手机上网行骗；自2012年3月至2013年9月，其以购买原始股、帮人转学等事由，骗取5人共计160余万元。

若真如公方所说，郑某服刑期间依然“骗人不倦”，实在应该受到法律制裁。对如此惯犯，或许真有必要建立一个可供查询的“骗子榜”，进而减少公众上当受骗的概率。此外，若郑某真是在服刑期间用手机上网行骗，那服刑的犯人怎么可能有手机呢？不管是狱友的、他自己的，还是狱警的，都必然存在违法违规之处，这一点更该调查清楚。

“性感”求职碰壁

据《重庆商报》报道，重庆工商大学即将毕业的一位女生为求职，特意花3000元置办了一身衣服：紧身的包臀裙，缀着亮片的低胸衣及耳环等饰品。然而，穿上这身衣服后，她的求职路屡屡碰壁。老板告诉她：这身打扮很时髦，但太性感做作，给人印象不好。

求职应聘大体得体、干净整洁，会给考官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而浓妆艳抹、裸露性感显然不会受到正规公司的青睐。时下一些女大学生求职时乱穿衣，或许多少受了一些影视剧影响，因为那里面的职场女郎往往都是“凹凸有致”的。但不要忘了，艺术和现实之间是有区别的，盲目模仿有风险。



“提款机”

据新华社报道，10年受贿200余次，千万“家产”中，受贿金额250余万元，另有810余万元无法说明来源，78家农企成了安徽省农委农业产业化指导处原处长金树芳的“提款机”。多位涉事企业负责人表示，他们与金树芳仅是朋友间正常往来，逢年过节送点东西是人之常情。

花钱能办事，花钱买心安，花钱随大流——这是案件中涉事企业负责人对官商“人情往来”的三种心态，其安之若素的表态值得反思。而根子还在官员一方。如果缺乏法治意识，缺乏廉洁从政意识，那么，面对所谓“人情往来”中的利益诱惑时，一些官员往往会慢慢放松警惕，与商人勾肩搭背，称兄道弟，混淆了情与法、公与私的界限，一步步陷入权钱交易、徇私枉法、违法乱纪的深渊。

□赵春青/图 如意/文



“大尺度”车模该叫停了

□雷钟哲

据10月22日《西安晚报》报道，在几天前的2014第十五届武汉国际汽车展览会上，有车模们透视装大露后背，薄纱遮臀爬上车顶，摆出性感挑逗的姿势，瞬间吸引不少“手机党”一阵狂拍。随后，这一组照片在微博、论坛上广泛传播，引发网友吐槽。

引发吐槽的车展和车模，岂止这一次。一段时间以来，车展与车模“难舍难分”，仅今年举办的西安车展、上海车展到广西车展，几乎每一次汽车展会，身着“大尺度”服装的车模

都会引起舆论哗然，以至有人提出质疑：这是“车展”还是“肉展”？

恕我愚钝，一直没有弄懂车模之于车展有何意义，也不知车模和车展的“疯狂联姻”始于何时。我想，车展就是汽车展示，众多汽车厂家在一个确定的时间和地点，集中展示和推销自己的产品，尽可能引起公众的关注，吊起公众的胃口，即使消费者现在没有购买欲望或消费实力，也要使其成为“潜在消费者”。

作为消费者，选购什么品牌汽车，当然要多家对比，毕竟汽车是家庭消费的“大件”。没

听说过谁买汽车，是因为这款车的车模特别漂亮、性感。也就是说，车模性感甚至“露点”，并不能催生购车的欲望，只是吸引了猎艳的眼球。

想来，车模和车展的纠结，自有其纠结的道理。车模的“裸、露、透”会引起车展爆棚，引来更多的观众。人气旺了，就能吸引更多商家参展，车展展位就会升值，展位价格飙升了，主办方就有钱赚——这大约是车模存在的价值。

但是，车模如果既不熟知汽车性能、品牌历史，也不能通过自己静动结合的各种造型，

(上接第1版)

针对非公企业劳动竞赛“为谁赛、赛什么、怎样赛”的疑虑，浦东新区总工会今年选择50家非公企业作为示范单位，探索“契约化劳动竞赛”新模式。

所谓“契约化劳动竞赛”，简要地说，就是按照依法推进、互利共赢、共同协商、因地制宜四项原则，由企业、工会和职工三方通过契约方式共同约定竞赛的各自权利和义务。竞赛的主题和内容、竞赛成果的分享方式等，从内容上保障竞赛贴近企业需要和职工需求，从机制上保障竞赛促进企业发展、维护职工利益，实现企业与职工的互利共赢。

“这种契约化推进方式，赋予了劳动竞赛全新的组织形式，解除了企业与职工思想认识上的疑虑，进一步带动了企业与职工参与劳动竞赛的积极性。”洋帆实业有限公司技术组组长、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上海市优秀农民工王何深有感触地说，“借助三方契约约定的机制，我们企业将‘小打小闹小创新’提升为普遍的群众性科技创新活动。”

王何介绍说，在该公司劳动竞赛的三方约定中，采取了物质奖励与精神鼓励相结合的激励方式，对于劳动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的职工，企业实施专利申报指导、现金奖励、职位晋升等激励措施，并设立创新成果

奖、创新明星奖等，并给予从1000元到1万元不等的奖励。王何本人便是竞赛的受益者，他从一个来自安徽农村的缝纫学徒成长为拥公司30%专利的工人发明家，并以优秀农民工的身份拿到了上海户籍。

而在上海雅斯拓智能卡技术有限公司，劳动竞赛以“高师带徒”活动为载体，以提升员工职业技能为中心，以劳资双方共享劳动竞赛成果为原则，签订了《师徒带教协议》，对参加竞赛过程中带教表现、工作表现等两大块11个具体项目进行了契约化约定。其中，契约化约定明确了对参加新区总工会的科技创新、金桥“职工职业技能比武”、公司金点子评选、职工交流计划以及创建特色班组与学习型企业等活动的师徒发放奖励金和带津贴，有效推进了企业的技能传承和高技能人才的培养。

“这种契约化的劳动竞赛，不仅能帮助企业提效增能，还能培养一支高素质、高稳定性的工作队伍。”雅斯拓公司总经理岳伟介绍说，该公司属于新兴半导体产业，曾因某些岗位人才紧缺而苦恼不已。“高师带徒”竞赛让公司管理层看到了一个极具操作性的解决方案。

据初步统计，浦东新区劳动竞赛已吸引全区1.2万家企业、逾百万名职工参与，其中非公企业占70%以上。

考评机制推动竞赛持续发展

日前，为配套“劳动竞赛契约化”的探索，推动竞赛持续发展，浦东新区总工会正式下发了“劳动竞赛考核评估办法”。

根据该“办法”，各分赛区及参赛企业要以“三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共性与个性相结合、自评与他评相结合)为方法，以“四率”(知晓率、参与率、贡献率、满意率)为指标体系，以“五有”(有组织领导、有项目载体、有指标体系、有推进措施、有活动成效)为主要内容，通过自我申报、社会评估、评估公示、表彰奖励等四个步骤，形成符合企业发展、职工需求实际的多样化劳动竞赛考核评估办法。

外资企业上海微创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主席邵云华告诉记者，借着“劳动竞赛考核评估办法”出台的东风，该公司工会将依据赛区劳动竞赛评估工作要求，结合每年职工评优工作，创建了“先进分子协会”。依托协会平台，劳动竞赛的成果实行积分制度，每年末还要举行毕业“考试”。人员一年一轮换的“先进分子协会”不仅营造了争先创优的软环境，还帮助不少职工获得嘉奖晋升。

如今，如何巩固成效，促使劳动竞赛真正成为职工素质提升、企业科技创新、区域转型发展的重要平台，已成为浦东新区总工会紧紧围绕的攻坚目标。

造成会议多、文件多、检查多、扯皮多、降低行政效率。“周望说，‘协调’事倍功半，暴露出权力运行混乱、职责不清。

没有领导挂帅，就是对事情不重视；协调部门不多，就难以解决问题……上海交通大学行政管理系教授樊博认为，“有领导好办事”的惯性思维，短期看是重视，长期看会形成“懒政”惯性，结果是“不发文不研究，不开会不落实”。

随着一系列简政放权政策的展开，地方层面“领导小组”乱象得到了初步整治。但“割肉式”治理难完全挤出水分，还需要从“法治”入手，专家认为，“机构法定”是原则，亟须出台相关规定，避免设置“随意化”。

樊博认为，现代政府是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涉及比较复杂或重大、跨区域的问题可设立相关“协调机构”，其他要慎之，防止冗员。部门若都守土有责、尽心尽责，就无需成立徒有虚名的“领导小组”。要坚决精简，真正做到“权随事设、责随事定、人随事走”。

□新华社北京10月22日电

青海规范干部婚丧喜庆事宜

本报讯 (特约记者邢生祥)近日，青海出台《关于规范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暂行规定》，对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予以严格规范和监督约束。

《规定》要求，党和国家工作人员要带头移风易俗，积极倡导新风正气，严格规范为本人及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其他直系亲属等操办的，或者委托他人操办的婚丧嫁娶、开业庆典、乔迁新居、庆生寿、升学留学、参军就职、工作变动、职务升迁、立功受奖等事宜，自觉抵制大操大办和奢侈浪费等不正之风。不得以任何方式邀请管理或服务对象及其他与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和人员参加；不得收受或索取管理和服务对象及其他与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和人员的财物；不得使用公款、公车、公物等。

《规定》要求，操办婚嫁喜庆事宜，应根据个人实际情况在操办之前填报情况报告表，事后填报情况报告表。对违反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有关规定要求，情节较轻的，给予诫勉谈话或批评教育；情节较重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湖北恩施“绿色发展”成效显著

本报北京10月22日电(记者邓崎凡)记者从今天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开幕的“世界硒都·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就展”上获悉，恩施坚持“生态立州、产业兴州、开放活州”战略，“绿色发展”成效显著。

据介绍，恩施把绿色作为恩施本色，坚持走特色开发、绿色繁荣、可持续发展之路，建设“美丽恩施”，全州森林植被覆盖率已达到70%，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353天，被网友票选为7个“中国最佳旅游目的地”之一。

此次展览也是国家民委为纪念《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施30周年组织的“民族自治州成就展”系列活动之一。



户，结合各个供电所掌握的情况，逐户进行开箱检查，重点对挂钩用电、无表用电，及绕过计量装置窃电的情况进行查处。”该公司电能管理部主任戚裕介绍说。

通过一天的集中打击整治，共查处窃电用户38户，没收全部偷电设备，在当地引起了较大反响。村民纷纷表示，不会再贪图小便宜，做一些破坏电力设施或偷电的行为。除了打击窃电行为，稽查人员还对现场计量、用电管理不规范的情况进行了核查核对，并要求用户限期整改。同时，还向用户发放了宣传资料，提高他们规范安全用电的意识。

下一步，安吉县供电公司将继续加强用电规范化管理，对个别采取非法手段窃取电量，或绕过电力部门计量装置进行用电的用户，进行坚决的依法处理。

温暖更需要全体党员共同传递

党员。

高文钟称，这样的温暖更需要全体党员来共同传递，即日，他还将为奋斗一生的工作单位宜良一中捐赠5万元，用于帮助解决宜良一中教学资金的困难，帮助困难学生。

“领导挂帅”频现的背后，是无奈还是无能？

(上接第1版)

——“一把手”身兼数职，“三头六臂”忙开会？搜索即可发现，各类“领导小组”，动辄都是市长、副市长等领导亲自挂帅，担任组长或副组长。

2012年，山东滨州曾一口气公布了19个议事协调机构的领导名单，涉及节能减排、国土建设等多个行业，可“一把手”都是当地市委主要领导。这还不是最忙的，2009年，东部省份一县委副书记被安排担任近40个领导小组的组长。

牵头部门“兼职搞副业”，成员单位“心不在焉”，会议通常是带个本子“点人头”。“河南一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坦言，本来日常就能解决，却需要领导小组讨论。出台一项规定，十几个单位会签，时间就更难控制了。”

——一年难得一次协调，成为“空壳机构”？上马容易，领导大笔一挥即可成立，但一些小组在成立后却陷入“沉睡”，成为“僵尸机构”，清理仍非常困难。例如，2013年辽宁省撤销了“省防治非典指挥部”，而此时距离“非

典”已有十年。

一些地方政府，对自身到底设了多少个领导小组都说不清楚。”南开大学讲师周望说，实际上许多领导小组都是“纸上机构”，从发文件成立，到发文件撤销，期间可能从未正式“领导”或“协调”过。

——“红头文件”搞创收，沦为行业“钱袋子”？由于指向性明确，一些领导小组为了完成自己的任务，甚至下发文件，成为乱摊派、乱收费的“护身符”。

陕西咸阳曾大力推广“足疗”保健项目，为此专门成立“推广足疗保健工作领导小组”，市领导挂帅亲任“小组长”，下发红头文件严禁公安进入检查，要求执法行动必须由总工会牵头，2009年，湖北公安县卷烟市场整顿工作领导小组曾下发文件，规定行政机关的“用烟考核”任务。

——“协调”